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拉美研究报告

2012年第3期（总第3期）

拉美中产阶级的兴衰对中国的启示

郭存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ILA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



《拉美研究报告》

出刊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坚持“三大强院战略”（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着力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科研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

在实施创新工程过程中，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学术观念、选题、研究方法、组织形式、人员配置等多方面入手，全力推进对当代拉美经济社会及中拉关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已陆续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实现了创新工程的良好开局。《拉美研究报告》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适时发布本所研究动态、传播相关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力、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拉美研究报告》是本所实施创新工程的主要内部信息载体，以力求时效、简明为基本目标。其所载内容、所体现的观点均为研究者本人及其团队的初步分析和意见，欢迎读者予以反馈和指正。

拉美中产阶级的兴衰对中国的启示

郭存海

内容提要

过去70年里拉美中产阶级兴起—衰落—复兴的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经济增长之于中产阶级发展的关键性，国家及其政策之于中产阶级发展的“推手”作用，以及社会政策之于中产阶级的培育、支撑和保护作用。拉美中产阶级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启迪了中产阶级问题正若隐若现的中国。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生存焦虑症、向下流动的恐惧以及社会新底层扩大化趋势，都充分说明对这一新兴的关键群体施以政策援手的迫切性。中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和话语渠道得到保护和保障，其“社会稳定器”的功能才可能发挥作用，至少不致于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拉美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40~1980年的形成和巩固阶段、1981~2002年的停滞和衰落阶段，以及2003年以来的重启和复兴阶段。总体来看，拉美中产阶级的这种发展历程大体呈现一种U型的变化趋势。反思拉美中产阶级的这种演变趋势，至少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发现。

首先，经济增长是拉美中产阶级发生、发展和巩固的源动力，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是中产阶级成长的关键。20世纪40~70年代中后期是拉美中产阶级快速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

各国经济总体上呈现一种快速、稳定的增长。而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则从反面佐证了中产阶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这个时期，伴随着经济衰退或震荡，中产阶级的发展出现了停滞或萎缩。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经济重现增长活力，特别是2003年以来更是实现了长达十年的稳定增长。这种有利的形势推动拉美中产阶级的规模达到或者超越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上述趋势充分说明，中产阶级的成长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基础和保障。

其次，国家的“有形之手”在中产阶级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推

动作用。从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一直到80年代初，拉美公共部门的扩张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职业，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这个时期，拉美中产阶级壮大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源于国家驱动。其后，拉美社会经历了近20年的市场化改革，国家的主导作用日渐削弱。自2003年以来的十年里，拉美的中产阶级重现活力，这个时期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源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即市场驱动。从全球趋势来看，作为“有形之手”的国家机制在推动中产阶级形成和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下降，而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尽管如此，并不能由此认为，在市场社会条件下，中产阶级的成长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个人行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的发挥。事实上，市场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国家作用的发挥，因为成熟的市场社会都是建立在国家提供的制度化条件的基础上——这是市场社会良性运行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结构性调整和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中产阶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和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中产阶级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显著的差异源于国家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平衡关系：美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之前，作了充分的制度化保障，建

立了强大的政策支撑；而拉美在市场面前放弃了国家的作用，任由中产阶级独力迎接市场的冲击。

最后，社会政策是培育、支持和保护中产阶级发展的主要工具。拉美中产阶级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政策失灵或政策赤字是20世纪80~90年代中产阶级陷入停滞、萎缩乃至迅速陷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发展和壮大中产阶级的源动力，是一种进攻路径的话，那么良好的社会政策则是一种防御路径，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中产阶级群体起到防护和支撑作用。事实上，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良好的社会政策本身也可以助推中产阶级的发展。比如，普遍而高质量的教育既可以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本，同时作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其也是向上进入中产阶级的关键路径。再如，更具累进性的税收制度不仅可以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促进分配公平，而且可以积聚更多的经济资源，增强政府的财政调节能力。而一个强大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则可以产生强大的保护作用，有效地减缓经济衰退对中产阶级的冲击，避免中产阶级一蹶不振，陷入“新贫困”。

上述结论表明，个体向上社会流动、进入中产阶级固然需要个人的努

力，但同样离不开良好政策的培育、支持和保护。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外部的政策因素对中产阶级成长的影响非常之大，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未来中产阶级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系于拉美的社会政策。因此，拉美国家要真正建成20世纪70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中产阶级社会”，当前及以后就应当着力于社会政策革新，推动一场政策理念革命，着力缔造一种“包容中产阶级的增长”（inclusive middle-class growth）。历史告诉我们，增长的引擎是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参与民主治理、争取社会保障和社会权利，拉美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基于此，当下和未来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不应限于中产阶级潜在的增长引擎这一角色，还应特别关注中产阶级自身的脆弱性。拉美未来的政策导向不应该集中于先关注穷人还是先关注中产阶级，而应该形成一种包容中产阶级的政策理念，以提高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中国和拉美同属发展中世界，面临着一系列相似的社会挑战，而且工业化先行的拉美先期遭遇的某些问题正在当下中国社会若隐若现。就中国而言，社会稳定无疑是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因为它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可

能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的未来。但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一种高压下的刚性稳定、强制稳定，而是一种基于动态均衡的稳定。经典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中产阶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壮大。相关研究数据表明，1999年中产阶级的比例大致为15%，2008年达到22%~23%，而根据2012年《国际城市发展报告》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达到总人口的40%。这些数据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中产阶级的认同感正在下降，“被中产”成为社会流行语正是这种现象的高度凝结和集中表现。这种苦涩的自嘲背后隐藏着向上社会流动和维持中产阶级地位的艰辛：高房价、高物价、看病贵、上学贵、收入增速慢，以及分配不公和相对剥夺感的上升，都成为中产阶级首先也是感受最强烈的领域。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更加剧了这种认知，由此引发的焦虑症几乎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阶级病”、时代病。不仅如此，社会流动性的减弱，甚至向下的社会流动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国内多家媒体联

合进行的一项“谁在沦为新底层”问卷调查发现，“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名列第一，最有可能成为社会新底层。通常而言，受过高等教育是当前进入中产阶级的门槛，也是新时期确立中产阶级地位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学生群体本应是中产阶级的后备军，但现在已经沦落为“蚁族”。社会底层通过“共同富裕”实现向上流动是中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但近年来中国的“新底层社会”呈扩大化趋势，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两种现象揭示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即中下社会阶层合流的趋势若隐若现：一方面，底层作为中产阶级的来源构成减弱了；另一方面，中产阶级成了底层的后备军。

拉美的历史教训表明，要真正发挥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就必须保障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拥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性。这正是中产阶级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的条件性。如果中产阶级的生存风险增加，精神焦虑不断上升，中产阶级的优越性不复存在，就可能同社会底层结盟共同成为变革的力量，到头来

不仅不会充当“社会稳定器”，反而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子，加剧社会的动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拉美多数国家，以及21世纪初在阿根廷发生的抗议和骚动就是鲜活的例证。而最近的中东、北非革命，也充分表明中产阶级绝非天然的稳定性力量。这反过来也显示出建立一种包容中产阶级在内的增长模式的重要性。

基于此，中国未来的社会政策同样应该给予中产阶级以重点关注，致力于确立一种“包容中产阶级”的发展理念，避免中产阶级沦为政策的夹心层。因此，中国未来要实现中产阶级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就应当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重点建立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解决收入不公平和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和增强社会流动性，特别是增强教育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可能发挥的纽带作用。最后，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进一步有序地释放而不是限制中下层群体，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公共参与空间。如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小康社会才是有可能的，和谐社会的建立才有根本性的保障。

作者简介

郭存海，男，河南项城人，197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法学（国际政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拉丁美洲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贫困和不平等以及拉丁美洲的腐败和反腐败等。

拉丁美洲研究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于1961年7月4日，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64年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1981年1月起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制。

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国内长期从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综合性研究的大型专业机构，研究领域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文化以及该地区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并为此设有经济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社会文化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综合理论研究室（马克思主义与拉美问题研究室）。该所还设有《拉丁美洲研究》杂志编辑部、文献信息室及行政办公室。

拉美研究报告（2012年第3期）

● 内容提要

过去70年里拉美中产阶级兴起—衰落—复兴的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经济增长之于中产阶级发展的关键性，国家及其政策之于中产阶级发展的“推手”作用，以及社会政策之于中产阶级的培育、支撑和保护作用。拉美中产阶级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启迪了中产阶级问题正若隐若现的中国。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生存焦虑症、向下流动的恐惧以及社会新底层扩大化趋势，都充分说明对这一新兴的关键群体施以政策援手的迫切性。中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和话语渠道得到保护和保障，其“社会稳定器”的功能才可能发挥作用，至少不致于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拉美研究报告

主 编：郑秉文

学术秘书：刘东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

邮 编：100007

电 话：010-64039022

传 真：010-64014011

编 校：知识产权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排 版：智兴设计室·张国仓

印制时间：2012年7月16日